

了造反後又鎮壓造反派，最後卻又被定為「步步倒向造反派」的張平化……書中都有些值得注意的記敘。

陳益南此書不僅內容豐富，文筆清朗，而且具有很強的歷史感。書中穿插了不少站在當下的角度回顧歷史所發的議論，不僅以親身經歷、切身感受為其堅實的基礎，而且閃耀着作者多年研究反思「文革」歷史的理論光輝。雖然此書只是一部紀實性的回憶錄，但它在「文革」歷史研究的理論高度上，卻足以讓許多人云亦云的所謂「研究」著述相形見绌。

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，對「文革」歷史的回顧與研究，在「文革」發生地成了「禁區」，而且，對這一「禁區」的封鎖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

四十周年的2006年達到了「史無前例」的地步。不過，令人欣慰的是，就在這一年，仍然在香港出版了兩部由親歷者所寫的有關造反派的很有價值的書，一部是周倫佐的《「文革」造反派真相》（香港田園書屋出版），一部就是陳益南的回憶錄。前者是從理論上全面考察研究了造反派的性質、構成及其歷史演變；後者是以親歷親見的回憶記敘了一個人、一個企業、一個城市中造反派的造反歷程。前者在理論的闡述中穿插了許多具體人物和事件的生動實例；後者在紀實的內容中又不乏理論思考的深度和對「文革」大背景研究的廣度。這兩部書都應該成為研究「文革」歷史特別是造反派歷史的必讀書。

「過客」學者的心靈史

● 張向東



李歐梵：《我的哈佛歲月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5）。

李歐梵是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研究的著名海外華裔學人，他上個世紀50、60年代在台灣大學讀書時，就與同學創辦了有名的《現代文學》雜誌。他在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，1970年獲得博士學位後，先後在美國和香港的多所大學任教。2004年從哈佛大學退休後，到香港科技大學從事文化研究。目前，李歐梵教授任香港中文大學一

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名譽主任。

在李歐梵的所有著作中，我最喜歡讀的是他新近出版的個人學術傳記《我的哈佛歲月》（下引此書只註頁碼）。此書在短短的一、兩年內先後在台、港、大陸三地連續出版，足以說明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。

「伊凡·卡拉瑪佐夫式」 的知識份子

1962年，李歐梵到了芝加哥大學學習國際關係不到兩個月，就陷入了「存在」危機，他這樣質問自己：「我來美國幹甚麼？為甚麼要學這種『遊戲』？為甚麼要啃這些似懂不懂的理論天書？」（頁14）他除了在這個非我族類的大城市飽嚙疏離、寒冷、飢餓和奔波疲勞之苦外，更讓他難以忍受的還是心靈上的空虛：

每天除了想像之外就是不斷問着同一個問題：我到美國來留學的意義到底是甚麼？前途渺茫，就像深冬結了冰的密歇根湖：凍成一片白色，一望無際，看不到彼岸。（頁18-19）

1963年暑假，當李歐梵在即將進入哈佛大學前夕，讀完白先勇送他的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（*Brat'ia Karamazovy*）時，他說：

到了那個關鍵時刻，我突然領悟到自己將來要做甚麼了——我要做一個像伊凡·卡拉瑪佐夫一樣的知識份子！俄文intelligentsia（知識份子）這個字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，似乎是一種特別的「族類」，我如果能身

為其中的一員，就會解決我的一切認同危機。（頁27）

他借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中伊凡給阿遼沙講的關於宗教大法官對人類在面對「良心」和「麵包」時的永恆困境的論述後說：

這個寓言恰好印證了我內心的矛盾：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的「真理」，可能對大多數人無利，甚至有害；如果他為了眾人福利而蒙蔽自己的良心，那麼，他個人的生命意義又何在？（頁27）

李歐梵雖然這麼說，但也從來沒有解決他的認同危機。在我看來，正是伊凡式的知識份子對他的啟發，使他的一生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救的認同危機。這種危機不是獲得「知識份子」這一身份所能解決的，相反，它恰恰是知識份子這一「族類」的標誌。因為在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中，伊凡的痛苦就在於他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不斷自省和追問：「人類存在的秘密並不在於單純地活着，而在於為甚麼活着。當對自己為甚麼活着缺乏堅定的信念時，人是不願意活着的，寧可自殺，也不願留在世上，儘管他的四周全是麵包。」「對於人是再沒有比良心的自由更為誘人的了。但同時也再也沒有比它更為痛苦的了。」（陀思妥耶夫斯基[Fyodor Dostoyevsky]著，耿濟之譯：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，上〔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〕，頁380-81）。

從芝大到哈佛，李歐梵依然無法消除由於對人生意義的懷疑而帶來的困惑和虛無。他在哈佛選擇中

李歐梵到了芝加哥大學學習國際關係不到兩個月，就陷入了「存在」危機。他在《我的哈佛歲月》中記述了自己在這個非我族類的大城市飽嚙疏離、寒冷、飢餓和奔波疲勞之苦，以及心靈上的空虛。

國近代史作為他的專業時，同樣面臨着「伊凡式」的在「麵包」和「良心」之間抉擇的困難：

作中國史的研究純是為了獎學金，沒有太大興趣，是否選課時又會重蹈芝大的覆轍？費正清教授大名鼎鼎，謝文孫和他更熟，但我從他處聽來的「貼士」(tips)並不令我安心，甚至暗暗感到自己的興趣和他的不合。怎麼辦？(頁29)

哈佛的讀書生活雖然遠較芝加哥舒暢，「然而心中還是有點『納悶』，那種苦悶不是來自課業的壓力，而是來自內心生活：也許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影響太深，我感到我的精神煎熬仍然熾烈，甚至開始自疑，做個哈佛研究生，我還是平庸的芸芸眾生之一，看那些美國同學，一個個比我世故，在課堂上說得頭頭是道，而我呢？」(頁29)

李歐梵孜孜以求，要做一個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識份子，即現代的伊凡·卡拉瑪佐夫。他在社會認同和個人實現、制度和心靈、歷史和文學、婚姻和愛情之間的游移和彷徨，都是基於對人生意義徹底的自省和懷疑。這種自省對於當事者不免痛苦，但它正是人類尤其是知識份子取得進步的標誌。這裏突出的是對於人的自身，特別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關注。李歐梵從事於嚴肅的學術活動，但念念不忘他鍾情的音樂、電影，甚至使這些本來用以愉悅心靈的消遣方式躋身到他的研究領域。他對費正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重制度、輕人情的傾向的質疑，同樣說明了他的這種困惑心理：為甚麼費氏的書中關於「義和

團」的論述基本上都從西方傳教士的立場出發？為甚麼義和團的「奉民」都是沒有嘴臉的暴徒？這批下層人物的「心靈世界」(mental world)該如何描述？他們的入教儀式(和太平天國一樣)是否值得仔細研究？換言之，文化人類學這門學科怎麼沒有進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領域，而只是一味抄襲西方「現代化」的理論？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裏?!」(頁38)

李歐梵之所以由歷史進入文學，就是出於對歷史研究中對人，尤其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漠視的不滿。所以，李歐梵在學術研究領域裏的游移，是有其個人的內在原因和線索的。他研究歷史，但關心的是「人」，所以他以「五四作家之浪漫的一代」為其博士論文的選題，是要為五四一代作家的「心態史」作傳。這與他自己作為一個「放蕩不羈者」(free spirit)的心態有關。出於探究人類心靈的衝動，他進而在哈佛選修了歐洲思想史、俄國思想史、美國思想史等科目。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，也是與此相關。

他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之間不斷地遊走，彷彿就是那個不斷在「麵包」和「良心」面前苦苦思索何以取捨的伊凡·卡拉瑪佐夫。他有時以「狐狸」來形容自己的這種性格：

也許，人各有志，我的志向雖在學術，但個性上免不了沾染不少文人氣質(都是受了我的幾個作家朋友和藝術家老友之「害」)，總覺得人活了一輩子不應該只幹一件事，況且我又不是所謂「刺蝟型」學者，可以一以貫之，把自己的學問做到登

李歐梵孜孜以求，要做一個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識份子，即現代的伊凡·卡拉瑪佐夫。他在社會認同和個人實現、制度和心靈、歷史和文學、婚姻和愛情之間的游移和彷徨，都是基於對人生意義徹底的自省和懷疑。這種自省正是知識份子取得進步的標誌。

峰造極，變成「大師」。我的「狐狸」性格不改，做學問也是旁敲側擊，這裏聞聞，那裏嗅嗅，而且最愛「越界」——到其他相關領域去打游擊戰（美其名曰「跨學科研究」）。然而除了「跨學科」之外，我甚至還想從學術界跨出去，在學院內外做兩棲動物，游離不定，享受充分的自由。所以，提早退休，就是為了追求自由而自我解放。（頁180）

李歐梵之所以由歷史進入文學，就是出於對歷史研究中對人，尤其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漠視的不滿。他研究歷史，但關心的是「人」，他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之間不斷地遊走，彷彿就是那個不斷在「麵包」和「良心」面前苦苦思索何以取捨的伊凡·卡拉瑪佐夫。他有時甚至以「狐狸」來形容自己的這種性格。

「過客」學者的心靈世界

作者說他寫作此書「不是一本學術著作，而是一本知識性的回憶錄，從個人的經驗勾畫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」，是「回憶自己的心路歷程」：「人過六十歲以後開始懷舊，留學經驗當然是個人回憶中的『高潮』，特別是在哈佛求學的那段『八年抗戰』的歲月，更難忘懷，……」但此書並非純粹為了抒寫記憶，而是「自信當年的讀書經驗可以為年輕一代的學子提供少許啟發。」

李歐梵自己說他是「在文學和歷史這兩門學科中不停地徘徊遊走」。其實他何嘗僅僅是在文學和歷史之間遊走，他還遊走於台灣、美國、香港之間，文人與學者，學院內外，虛無與意義、婚姻與愛情，「麵包」與「良心」，現代與後現代之間……。正如劉再復所說，他簡直是一個本雅明式的城市漫遊者。他自己也說：

大概我從來不把自己當作美國人，也從來不覺得生在美國的華人是華

僑，再加上後來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參觀後，感受到華語文化在當地多元種族社會所處的微妙地位，……問題既然如此複雜，單一性的政治認同當然不夠，加以旅遊和移民的潮流影響所及，「認同」就不再那麼簡單。（頁140）

確實，《我的哈佛歲月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當作全球化時代知識份子命運的寓言，主人公就是一個永不停息地跋涉於疲憊旅途上的「過客」。

李歐梵的這種游離心態，同樣也表現在對於婚姻和愛情的困惑：

到芝加哥那年我四十三歲，人到中年總是比較容易感懷身世，向來我尋求浪漫，總覺得結婚跟一個女人廝守一世，將會是何等難耐的一回子事，所以一直拒絕婚姻。在印大我曾交過好幾位女朋友，都因為懼怕承諾終生而感情告吹了，到芝大前，我的一位親密波蘭籍女友想跟我有長遠的關係，我一時驚慌之下，加速了移居芝加哥的決定，到了芝大，對於陌生的環境，加上孤寂的心情，突然感動而泣，似乎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吧。（頁233）

他的妻子李玉瑩在〈歐梵在哈佛教書的日子〉一文中說，李歐梵作為美國知名學府的教授，誰知在他風光的背後，卻有斯人獨憔悴的一面。在芝加哥大學，他最怕的是週末的孤獨：

到了夕陽西下，窗外湖光渺渺，遇上寒冬氣候，天空密集了灰雲，灰

暗暗地、沉甸甸地壓將下來，令人透不過氣來，忽然間生起了萬念俱灰的感覺，卻又是欲哭無淚的味道，不禁讓我想起白先勇的小說《芝加哥之死》裏的人物吳漢魂，他投向密歇根湖的悲痛心情，我也親自感受得到。自己奮鬥半生，過了而立之年，仍然落得孑然一身，這何嘗不是我追求浪漫的代價？（頁234）

雖然他在個體價值的實現和社會認同之間不無困惑和矛盾，但他在追求心靈自由的同時，最為傾心於他的教學和學術事業，甚至這種外在的「功業」成了填補他心靈空虛、確認其人生價值的重要方式。在《我的哈佛歲月》中，李歐梵對學術的癡迷和對教學事業的鞠躬盡瘁是最為動人的。李玉瑩還說：

歐梵對教學嚴謹、認真、負責的態度，是極為少見的，他教書三十多年，每逢新學年開學的第一天夜裏，都緊張得睡不着，還做着同一個噩夢：他夢見自己上課去了，但找不着教室，找到了卻沒有學生在班上等他。我想這是課前焦慮症，由於太認真，他才會那麼焦慮。跟他在一起的五年當中，曾經有多次看見他半夜起床看書，他說明天要上課了，卻預備不足，睡不着……（頁238）

在美國執教之餘，他「到處趕着開會，為現代文學宣傳，希望打破美國漢學界對現代文學的偏見；但為了證明這一門新學科的價值我勢必勤加耕耘……。」（頁114）

李歐梵在講到他在哈佛所開的「文化中國」的核心課程時這樣說：

「記得1998年冬季我因背痛而不能上課，只好請我的研究生代課，但最後考試時還是勉強拄着拐杖去監考，以示負責。我為之鞠躬盡瘁到最後一年（2002年）把各個課題都竭盡心力講完了，然後宣布說此課從此壽終正寢。」（頁141）

對於李歐梵來說，唯有他所教育的學生取得進步和成就，唯有他嘔心瀝血的事業得到學生的理解和認可，才是對他心靈上莫大的慰藉。

李歐梵到哈佛執教以後，有一次受邀參加舍監舉辦的茶會，他因以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此種場合受到冷遇而心有餘悸，他說：

說來沒有人會相信，在洛杉磯住了四年，我的「自我形象」幾乎降到自慚形穢的地步……我積了一肚子怨氣，只好一股腦兒把它昇華成學問，全盤灌輸給我的研究生，心中覺得也只有我那幾個研究生尊敬我、體貼我。（頁123）

這一次在哈佛一進門就受到學生的熱情歡迎，他不無誇張地說，這位歡迎他的哈佛本科生在幾秒鐘之間治癒了他自慚形穢的「心病」，彷彿讓他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在哈佛體驗過的生活，頓時感到年輕了十歲。

他回憶起在哈佛的教學生涯中每有成就時，那種喜悅真是溢於言表：

哈佛的本科生修這種「指導課」時反而特別認真，從不缺課，而且準備充分，在課堂上交換意見時可以表現作為哈佛學生的聰明才智，

《我的哈佛歲月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當作全球化時代知識份子命運的寓言，主人公就是一個永不停息地跋涉於疲憊旅途上的「過客」。李歐梵的這種游離心態，同樣也表現在對於婚姻和愛情的困惑。

李歐梵回憶起在哈佛的教學生涯中每有成就時，那種喜悅真是溢於言表。他總結在哈佛的教學經驗，覺得感受最深的是學生的人情味。這些學生多年的關切，令他保持心理年齡永遠年輕，有時還覺得自己是學生。

也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，所謂「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」這句話，我終於在這種小班上體會出來，雖然我教的英才不多。每年還不到五六個，這也足夠了。(頁131-32)

這一連串「意識流」式的回憶，令我深深感覺到十年來在哈佛的教學經驗還是寶貴的。當然在現代文學方面，我訓練出來的博士也個個出人頭地，令我欣慰，然而更令我懷念的反而是這些「不倫不類」甚至「不務正業」或不夠專業的碩士生和本科生，他們在我的啟發下各發異彩，這才是我最引以為榮的教學經

驗，也因此導致我最終走向文化研究的道路。(頁134-35)

他總結說：

如果我需要總結在哈佛的教學經驗，感受最深的是學生的人情味。……有人說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我恰得其反，沒有做成父親，卻終生交到不少朋友，這些學生多年的關切，令我保持心理年齡永遠年輕，有時還覺得自己是學生，甚至到我退休的時候更覺如此。這是我保持「青春常駐」的秘訣。(頁157)

鑒別「文本」的新維度

● 陳愛中



耿傳明：《輕逸與沉重之間——「現代性」問題視野中的「新浪漫派」文學》(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4)。

儘管近幾年來關注者逐漸多了起來，但就新文學研究領域而言，「新浪漫派」依然是一個相對新鮮而陌生的詞彙，對於組成這個流派的徐訏和無名氏兩位作家的認識，恍若隔世仍然是讀者無法擺脫的第一觀感。就歷史現場而言，實際上「新浪漫派」文學曾經在上個世紀的